

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评十四世纪英国几个思想家

倪传铮

十四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犹如灿烂群星，先后升起。奥康的威廉（1300—1349）是英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市民阶级政治思想家、经院哲学家。威克利夫（1330—1384）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约翰·保尔（？—1381）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宣传者。他们的思想都放出异彩。人文主义者杰弗里·乔叟（1341—1400）和威廉·朗格兰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政治意识、观点同样使人耳目一新。

政治思想是分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即在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之上，首先是一个政治心理的层次；它不系统、不定型，是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直觉反映；其次是政治心理初步升华形成政治观点的层次；第三是系统化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层次，十四世纪的几个著名思想家分别代表了这样三个层次。

第一个群众政治心理层次，是以感情，自发的倾向和信念表现了反对旧教权、反对罗马教廷在英的特权，试图用自己的力量追求尘世、现实的幸福、要求改革封建制度的愿望。当时传统的束缚于土地，屈从于教俗贵族统治，强抑住感情冲动的状态演化成心理失衡的浪潮，具有冲决罗网的强烈势能。这种政治思想由约翰·保尔集中表现出来。约翰·保尔是英国的一个下层教士，农民起义前常以朴素的群众语言，宣传反对神权统治的思想。成为起义领导人之一，是瓦特·泰勒的亲密战友。在起义中他向人民宣教：不要忍受强加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困境，要“自己想出路”。①他怒斥高级教士，教皇争权夺利，在教会的大分裂中去分抢耶稣圣袍。又说，现在将开始他梦想和祈求已久的基督民主统治。②发动群众在兰姆伯斯、坎特伯雷、圣奥本斯、伯里圣埃得蒙德等地烧了大主教住

宅、杀了大主教，迫使修道院交出农奴自由特许状，使起义带有鲜明的反对教会特权的特色。他愤怒地揭露封建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平等，他指出，当时政府不维护农民利益，“我们又无处申诉，没有人听我们的话或为我们主持公道。”申言自己的“理想是一切都变为公有的，没有什么农奴，也没有什么绅士，而是大家团结在一起，领主们也不比我们高。”③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农民战争时说：农民平民异教“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④约翰·保尔就是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英国的杰出代表。诚然，他的信念是对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客观历史进程的自觉反映，仍不深刻；他对封建主暴行的揭露与抨击，基本上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与记录，还没有系统地论证自己的政治目标与价值观念，更多地是发出宣传鼓动性的号召。但是，他的信念、揭露、号召成为农民起义的精神支柱。他已初步觉察到封建制度与农民困苦、灾难的关系，并提出废除现制度的要求，具有自觉性的某些萌芽，蕴藏着理性因素，是高层次政治思想得以形成的素材，指导着群众的实践活动。恩格斯称约翰·保尔是“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⑤其涵义是很深刻的。

反映在乔叟和朗克兰著作中的政治观点，构成

①《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1964年186—187页。

②奥曼：《1381年大起义》，引自威尔·达伦特《改革：从威克利夫到路德》英文版，第二章第三节。

③《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1964年186—1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3页。

⑤同上第404页。

当时政治思想的第二层次，主要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杰弗里·乔叟是个高级官员，创作了大量诗歌。对社会，他以独特的幽默、抒情、讽刺的笔触表达了强烈反对教士丑行的情感。他说：“有德才有荣，假如行为不正，我敢肯定说就一无可观，哪怕你戴上了法冠、皇冕或花圈。”意思是等级高贵的贵族并不胜过品德高尚的民众。高尚的品德主要是“言而有信、沈静仁慈、宽厚待人、心地纯洁、且喜爱勤劳、厌恶懒散。”“世传的财富往往造成后代的恶行。”他强调对自由的追求，说：“愿上帝给你自由，领略人生真趣；无人甘于忍受奴役的命运。”^①这些都表现了一种藐视权贵、否定门阀观念的进步思想。

朗格兰著有《农民皮尔斯》一书。他直率地攻击教会，生动刻划僧侣的卑劣行径。说他们为一块钱可以出卖天堂。朗格兰认为教士已不再是救世之圣徒，不值得人们尊崇，他赞扬劳动，揭露社会上的不平等，辛辣地嘲笑寄生虫，试图以正直，勤劳，追求真理的农民形象作为理想的人物，他也提出某种改造封建制度的要求，宣传过“天下所有的东西，应该一律归公有。”有人说，朗格兰“那种人类本质在上帝面前都平等”的观念，以及对于社会各种虚伪的憎恨，劳工尊严的信仰，几乎使他的诗含有近代的意味。”^②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见解。朗格兰具有某种未来时代的民主性倾向，是与封建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正因为这样，《农民皮尔斯》受到下层社会的欢迎。

第三层次是奥康的威廉和威克利夫的理论中的政治思想。他们较多地以思辨、论证的理性形式表现出来。威廉是个经院哲学家，他从理论上向教会的权威挑战，推出哲学与神学分离的观点，认为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无法用理性的哲学来论证它，教会的许多信条“在逻辑上会导致无法忍受的荒谬。”他强调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辨，“主张哲学里除了经验和理性外，并无权威存在。”“建议除了有意识传播谬说外，应容许表达一切意见的自由。”^③他认为，国家与私有财产只有人民承认时才是合法的，人民具有最高权力是自然法则。^④应改革教阶制度。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教皇的统治权是一种异端，而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则是一项灾难的新发明，它使整个欧洲充满争吵，破坏了基督教的自由，并使世俗统治者的权利受到侵犯。^⑤

威克利夫是牛津大学教授，曾获得神博士学位。他强烈反对教会的特权，否定英国人民对教会、教皇的贡纳关系，说：“什一税纯粹是救济

金，”只能给教皇以救济金，给英国教会以供养金，主动权在人民。他提出教会民族化的主张。宣称：“英国王朝应该是一个整体，教士、领主、平民均为该组织之一员”。国家在一切世俗问题上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国家应该控制教会、可以没收其财产，授与教士职位，约束教士的丑行。应该用英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来进行宗教仪式。他系统地提出反对教会特殊地位的理论。反对“变体说”，否认耶稣的真实存在，说基督仅是一精神体。强调“人智”的作用，主张通过个人的修炼、攻读圣经、虔诚的祈祷与忏悔，可以不依赖教会神秘的作用而升入天国。他也提出一切事物都应该为正直者共同持有的理想。认为，私有财产与政府乃是亚当原罪以及人类承继下来的罪孽所产生的后果，在理想的道德完善的社会里，不会有个人的私有财产，也没有教会或国家的人为法律。^⑥

威廉与威克利夫既不是对现实做客观的描述，也不是用文学艺术的形象去表现自己的观点，而是以自己成体系的思想去冲击旧的神学家多年编织起来的、长期禁锢着人们的神学体系，从理论上为动摇神权统治开辟道路。对世俗政权和私有制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从自然法则的高度来论证世俗应有的权力结构与财产关系。这就使他们的思想高过直观的、朴素的政治心理层次和一般未构成系统的政治观点或艺术形象的层次，居于更高一级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层次。

这样，在同一时代中的几个思想家，却从不同的层次共同构成英国十四世纪进步的政治思潮。

二

这几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是十四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反映，是在群众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十四世纪英国 有两大矛盾交织着，并在不断激化。一是英国国民与天主教会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英国人民与封建贵族的矛盾。这些都进一步激化了城乡的阶级矛盾。这种社会环境是思想家政治思想形成的土壤，为社会诸矛盾所激

①《乔叟文集》第766页、777页。

②威廉·V·莫德与罗伯特·M·劳非尔特《英国文学史》，商务，第46页。

③威尔·达伦特《改革从威克利夫到路德》，英文版，第十二章，第五节。

④比尔《社会主义与社会斗争史》英文版第1卷，1957年第113—114页。

⑤萨拜因《政治学说史》1966年版上册，第358页。

⑥威尔·达伦特《改革：从威克利夫到路德》英文版，第二章，第二节。

起的群众愤怒和不满增强了思想家探索现实问题的热情和勇气。约翰·保尔生活在群众之中，直接感受到群众的脉搏，汇聚了阶级的要求和民族的愿望，也取得了自身思想的源泉。乔叟和朗格兰的政治情感、政治观点、刻划的艺术形象，也是观察社会矛盾，挖掘社会成员心理和深入思考的产物。乔叟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代表着市民的利益。市民阶级是未来资产者的前身，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力量，特别是一些商人（最突出的是羊毛业）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他们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观指导自身的行动，反映自身的愿望。他们积极进取，追求宽松一些的政治环境。乔叟符合了他们的需要，他在自己的生涯中，还广泛地接触过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官吏、市民、地主，又有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差役、医生、水手。这些生活实践既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又使他能深入思考问题。奥康的威廉属于方济各修道会，也有与下层社会较多交往的渠道。人民推动威廉提出民众反对统治者的权力问题。在信仰问题上，他提出限制教皇和教会上层人士的特权，认为：“皇帝的权力——确实也是任何王权——是来自臣民总体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是通过人民中间的权贵表达的。”^①这样从宗教领域到国家政治制度都推出了俗民的权利问题。威克利夫既通过大学讲坛与社会保持广泛联系，又直接组织“穷牧师会”，让他的信徒们以托钵僧的身分深入民间，宣传他的主张，并带回社会民众的情绪和要求。威克利夫一直坚持对社会的批判，对教皇特权的否定。虽然他因此多次受到迫害，著作被宣布为非法，活动受到限制，信徒被逐出牛津大学，他始终没有动摇。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强调：“教皇应把所有对俗界的统治权交给世俗政权。”他之所以有这种可贵的勇气是因为他感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群众给思想家的滋养不受国界的限制。先进思想固然是民族的产物，又要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去理解其源泉。在这方面，乔叟表现得比较典型。他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官，多次出使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意大利盛吹的思想新风给他很大的震动。早期文艺复兴大师等人的作品给他深刻的影响。他从先期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城市市民身上，朦胧地意识到了未来资产阶级的形象、精神以及英国社会前进的趋势，也感受到民众对先进思想家的爱戴和支持。回国后，他把意大利的新鲜活力注入英国文学与社会思潮中去。他仿效意大利思想大师，努力去挖掘，表现普通人的情感，重视人性、人权自由。其他人的思想也有相似的性质。保尔有句话脍炙人口：“当

亚当耕耘，夏娃纺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个名言首先是在西欧各国民众中流传，保尔将它与平等观念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思想更赋有光彩。奥康的威廉与威克利夫同外国教士、外国学者、大学师生探讨问题、交流思想则是众所周知的。

在先进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时代的特征留下了深深的胎记。时代为思想家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时代的前进步伐也就必然给思想家以影响，促进他们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观点。十四世纪是旧的社会结构中酝酿着新因素的时代。农奴制仍然是封建经济的支柱，但已渐趋瓦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孕育着新的经济成分；封建贵族仍居统治地位，但市民阶层、平民阶层已有相当力量，正产生新的资产者，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在母体中躁动。这种状况使得这些人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两重性。旧的观念和新的思想并存于一体。保尔和他的战友瓦特·泰勒都对国王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又大胆地去勾画没有等级差别的新社会蓝图。乔叟不时流露出消极忍让的思想，宣传：“缩衣节食的日子”，要人们“知足自乐”；“学习逆来顺受遇事谦恭温良”，告诫人们“若强求，就自投末路。”^②他崇尚的道德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封建的忠诚信义之类的内容。可是他在抨击社会的丑恶现象和封建特权时，既不“忍让”也没有谦恭，而是满腔怒火尽情喷射，挖苦、讽刺、咒骂何地淋漓尽致。朗格兰一方面说：“私有制是一种神圣的制度。”^③同时又提出未来社会应该一切归公，流露出改造社会的朦胧的愿望。威克利夫将上帝视为最高权威，世俗权力的源泉，说：“王朝隶属于上帝，非此不能有繁荣。”但又大胆否定基督的真实存在，只要人民去纪念耶稣的精神体。奥康在几个人中是倾向于保守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主张是继承着方济各修道会神学家邓斯·司各脱的传统。他甚至对于教皇的广泛的自行决定的权力也并不真正反对，只要这项权力是由他可以承认的一位真正的教皇所行使的。^④但是他的理论冲击的是整个基督社会的思想基础，而且不回避世俗权力结构与民众权力这样的社会敏感问题。因而这几个思想家思想中的两重性，既是他们局限性的表现，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作为一种落后的现象。相反，是意味着前进。即在旧传

①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中文版，第360页。

②《乔叟文集》第764—765页。

③比尔：《社会主义与社会斗争史》第2卷，英文版，1957年第38页。

④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中文版第360页。

统的观念基础上跨上了新的台阶,探索着通向未来的途径。

这些思想家形成过程中,各人的阶级利益如同一个筛选器在各人思维过程中发挥作用。社会政治心理中的积极因素和零散思想为先进思想家捕捉,并得到加工。这是他们可贵之处,但是经过阶级利益的筛选器,过滤后留存下来的多数是与思想家自身的思想结构、价值取向一致的内容。乔叟、朗格兰、威克利夫、威廉都是市民阶级的代表,市民阶级的阶级利益通过他们的意识内驱力不断地起着调节的作用,以各自原有的思想结构去改变下层民众传来的政治情绪的刺激,使自身在稳定状态中发展原有的思想体系。乔叟思想中的一些模糊观念,没有明确地改造旧制度、旧社会的要求,反映了他们代表的市民阶级意识还处在自发阶段中更为原初的混沌状态。朗格兰着意树立的形象——皮尔斯只是一个富裕农民,他雇佣工人,对雇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很不满意,咒骂工人是“无用货”,不断加重对雇工们的剥剥,警告说:“饥饿将要和大水一齐重来”。这个人物和朗格兰本人都是市民温和派。他们反对封建特权,不能接受下层民众激进的反对剥削制度的愿望和要求。奥康的威廉的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极高的概括抽象力,但他的思想是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没有从理论上去论证农民平民异教的平等思想,他并不赞赏农民与平民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底层的根本利益。威克利夫一度产生激进主张。但是农民起义发动后,他的意识内驱力发挥了作用,终于发表文章劝导信徒们“耐心顺从尘世的领主。”说“现存的权力,如保罗所言,仍是上帝授予的,所以人们必须服从之。”宣布他的所谓共产社会,应被理解为只是一项理想中的意识^①,人们不必急于实现它。社会思潮有可能彻底排除思想家的思想筛选器,改变思想家原始的阶级意识,但是这几个思想家没有实现这种转变。

农民与平民的阶级局限性也限制了约翰·保尔思想的高度。以保尔思想为代表的农民平民异教没有升华为更高的理论层次,就与这种异教性质紧密联系着。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与平民不是创造新社会的独立政治力量,以当时最革命的平等的平均思想为基础的对社会未来发展设想,是建筑在“空想”的基础上。要对这种政治设想作系统的理论论证,本身就存在极大的难度。成体系的政治学说只能是思想家在社会实践中自觉思维活动的凝结物,它需要十分艰苦和复杂的脑力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学说“是这一阶级积极的,有概括

能力的思想家”^②所专门创造的。其他阶级的学说也是如此。封建社会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界限。十四世纪那个时代的封建剥削制度更使农民平民没有足够的知识、精力、理论抽象能力去概括、提炼自己的政治思想。约翰·保尔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檄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思想,表现了劳动者在革命政治实践中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但那不是将政治思想系统化的论文,如果那样去要求将是可笑的。

三

十四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分成三个不同层次。虽然各自思想高度不同,各有各的局限性,但是从整体上说,它们又共同汇合成有深度、有广度、有理论、有声势的进步政治思潮。他们以反旧教权、反教皇、改革现实的政治关系的要求为核心内容,具有多彩的风貌、执着的力量。它们在英国封建制度日益深刻的危机基础上形成,反过来又加速了英国封建制趋向衰落的过程。

这几个思想家的先进思想植根于群众之中,故具有掌握群众的强大威力,从不同的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奥康的威廉和威克利夫提供了改革教会的理论武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神学家也接受了威廉的观点。一些大学为他的“哲学争辩得辗转不安,”急忙禁止讲授他的学说。^③一些人尊称他为“不可战胜的博士。”^④威克利夫学说风靡一时。当时有人形容说:威克利夫派“象发芽的植物滋长极快,而遍及全国……当你在马路上行走,遇到两个人,其中之一就会是威克利夫派的信徒。”^⑤这些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当时英王与国会接连采取断然反对教皇特权的措施。强制性的措施、法令与社会上反教权、反教皇的民族思潮结合,使英国反教权运动具有极大声势,成为各国教会民族化运动的先驱,为二百年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播下了种子。十六世纪英国开始的宗教改革的基本内容,无一不是在十四世纪时开始提出并且在不同阶级中逐步扎下根来的。正如后人所说:十四世纪末,清教徒的心理及观点,已经在大大列颠形成。威克利夫“已经说出了后来成为新教基本

^① 威尔·达伦特:《改革:从威克利夫到路德》英文版,第二章,第二节。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③ 威尔·达伦特,前引书第十二章第五节。

^④ 梯尔:《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1975年第244页。

^⑤ 柯尔顿:《黑死病》引自威尔·达伦特前引书第五章第四节。

教义的思想。^①正因为这样,威廉和威克利夫死后,教会仍对他们感到恐惧。威克利夫死后多年,罗马教廷还再次宣布他为异端首脑,烧毁其著作,挖掘其坟墓。到了1523年伦敦主教詹姆斯达尔说路德并不是什么有害的新奇东西,它只是给大批威克利夫异端派添加了才来到的武器而已。”^②

十四世纪先进的政治思想将英国长期以来的反对封建斗争推向新高峰。要求改革封建制度的思想主张和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相互促进,成为起义农民的旗帜,保尔的思想引导农民重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农民的斗争意识,起了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的作用。当然,以均平观为核心的空想主义最后将农民运动引入死胡同,这个消极作用也是历史的必然。威克利夫一些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虽然还不能肯定说它曾直接推动了农民起义,

但是,也不能否认威克利夫思想曾影响过罗拉德派。这支秘密教派在农民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③曲折地表现了威克利夫思想的作用。

这几个思想家的思想也构成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出现的政治思想新高潮的先声。表面上看他们的思想与若干年后的高潮之间还缺乏明显直接的继承关系,前后间有很大的起伏与间隔期。实际上他们为后者留下了可贵的思想资料,起了奠基、探索的作用。英国在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中虽然生产遭到破坏,大片土地荒芜,但是十四世纪先进思想没有从人们心灵中消失。没有十四世纪的政治思潮就没有十六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新发展。

他们的思想对整个西欧也有重大的影响。当时西欧各国政治思想发展很不平衡。意大利正处于

文艺复兴的前期阶段,那里“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④正在涌现。德国进步思潮的高涨还没有到来,虽出现了有积极意义的神秘主义者,影响不大。社会上一些活跃的政治思想家多数不是德国人。如与奥康的威廉齐名的马西略(约1270—1342),曾长期在巴伐利亚王宫内供职,是一个意大利人。法国异端思想在十三世纪曾经是十分活跃的。后来阿尔比派遭到多年的残酷镇压,大批活动家被杀害。思想文化的复苏有待一个过程。不料百年战争中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遭到破坏,妨碍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形成,整个政治思想的发展正处于一个低谷期。在这样的时期,英国出现的内容丰富的新的政治思潮,它与意大利遥相呼应,并峙于西欧的大地上,弥补了德法思想领域的一些空白点,后来德法两国的思想家都引进英国和意大利大师的先进思想,促进本国思想的发展。十四世纪英国以这几个思想家先进思想为代表的新思潮不仅标志着英国,也标志着整个西欧的新思想正痛苦地又不可阻挡地从旧时代的精神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未来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前奏曲,酝酿着,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①马克思·萨非尔等人:《世界文明史》,英文版,第1卷,第615页。

②摩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英文1979年版,第1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

